



档案里的

金融春秋

朱纪华◎主编

学林出版社

档案里的

金融春秋

朱纪华◎主编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档案里的金融春秋 / 朱纪华主编.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12. 6

ISBN 978-7-5486-0328-3

I. ①档… II. ①朱… III. ①金融—经济史—中国—通俗读物 IV. ①F832.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53409 号



档案里的金融春秋

主 编——朱纪华

特约编辑——刘益民

责任编辑——吴耀根

封面设计——周剑锋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81号3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照 排——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刷 印——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710×1020 1/16

印 张——14.5

字 数——28万

版 次——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86-0328-3/I·61

定 价——30.00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序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当今世界,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和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我国的文化改革发展进行了战略部署,为档案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档案作为社会活动的真实记录,具有天然的文化属性和不可再生的唯一性,档案管理部门理应发挥集聚与发散历史文化信息这一独特长处,坚持为社会大众、为加强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利用、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价值体系的建设,提供优质的服务。同时,档案文化也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觉深入地认识档案的文化价值,挖掘档案的文化内涵,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档案文化,满足人民群众快速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是档案部门不容懈怠的职责。

《档案春秋》是上海市档案馆精心打造的档案文化品牌,一直受到上级领导和广大作者、读者的关爱。她依托丰富的档案信息资源,蒐集精彩图文,致力于还原历史真相,传播档案文化。她不仅以严谨、严密以及鲜活的风格,在历史人文类杂志中独树一帜,而且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档案信息的知情权,填补了市场空白,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可。2010年《档案春秋》获得第四届华东地区优秀期刊奖,是上海地区唯一获此奖项的历史人文类期刊;2011年度荣膺网络传播国外公共图书馆阅读 TOP100 排名。

近三年来,我们尝试以“书”的形式,把档案文化的散在成果集中起来,进行二次传播,先后出版了《档案春秋丛书》第一辑、第二辑和《那个年头那些事》等五种书籍,收获的市场好评超过了我们原先的设想。我们理解,读者之所以在信息爆炸的今天,仍愿意阅读《档案春秋》,是因为他们不仅可从中获得丰富的历史信息,满足人类所共有的对未知世界的探求欲;而且这些档案背后的故事,或许在某一层面上与他们的个人记忆关联或相互碰撞,从而为他们认识某段历史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档案文化的核心资源是记忆,从某种意义上说,记忆即历史,是任何一个民族

藉以安身立命的文化之根。挪威档案学家列威·米克伦曾经说过：“没有档案的世界，是一个没有记忆、没有文化、没有法律权利、没有历史的世界。”近年来史学界有一个共识：尊重历史，以档案说话，还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本来面貌。因为在诸多历史元素中，档案的可信度是最高的。随着中国社会政治开明度的日益提高和法制建设的完善，档案的解密与开放已纳入常态化的管理轨道，许多曾束之高阁的档案材料开始进入社会视野，比如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问题、中共党史中的一些话题等，受到了学术界和普通民众的广泛关注。尤其是近年来新中国部分外交档案的开放，不仅价值非凡，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示范意义。

本书各篇目涉及近现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具有独特的史学研究价值，并能体现档案信息集真实性、内幕性和可读性于一体的特征。这些文章的作者都是专职的档案工作者或历史学者，他们在尘封的档案中勤奋爬梳，努力打捞历史真相，并以新的视角给读者启发。叙述风格或深沉内敛，或平实朴素，但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以严谨的、非虚构的方式写作，用事实说话，尽可能多地向读者呈现历史细节，把读者带入历史现场。

档案是历史发展的记忆，是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遗产，档案部门应把档案文化放在档案事业发展体系中更加突出的位置，发挥档案独特的文化功能，彰显其在国家文化软实力中的固有地位，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应有贡献。

朱纪华

（上海市档案局局长、上海市档案馆馆长

《档案春秋》杂志编委会主任）

目 录

序	/ 001
---	-------

上篇 暗流涌动的金融风潮

孙中山倡建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办始末	/ 003
1921 年上海证券交易所风潮	/ 009
孤岛时期的交易所黑幕	/ 013
交易所风潮后的无情兼并	/ 020
近代上海股票的起源和橡皮股票风潮	/ 024
旧上海股票交易“茶会时代”	/ 030
生死之搏——七十年前的证券大战	/ 035
一张创造社出版部股票	/ 039
旧上海的人寿保险业	/ 042
洋布、洋布商与洋布交易	/ 046
旧上海的典当与押店	/ 051
震惊朝野的“纱交事件”	/ 055
清末民初的上海田单及其有关文据	/ 061
一张解放初期的“摊贩许可证”	/ 063
话说老上海代价券	/ 066
长沙中央银行黄金偷运去台始末	/ 071
乱世商机	/ 075
大陈纸钞：为了迁徙的纪念	/ 087

远东最华贵的财富堡垒——上海汇丰银行大楼	/ 093
抵制美国货：100 年前的华洋冲撞	/ 101

下篇 金融春秋里的人和事

民国公子张伯驹银行蒙难记	/ 115
项氏父子和五洲惨史	/ 125
“金子大王”王伯元	/ 131
“远东保险王”史泰的经营之道	/ 137
陈果夫在上海做经纪人	/ 141
海上闻人黄楚九“创业”记	/ 143
开创中国人身保险业的吕岳泉	/ 153
实业大王刘鸿生	/ 160
旧中国银行家张嘉璈的别样人生	/ 165
中国保险业先驱胡咏骐	/ 172
上海钱业第一人秦润卿	/ 175
顾准，大上海 1949 年的经济符号	/ 180
从所谓“杜月笙故居”说起——祖父章荣初的“实业救国”之路	/ 189
肃贪，无奈的民国故事	/ 201
1941 年上海银行大血战内幕	/ 206
甘肃冒赆案：清代第一大贪污案	/ 213
尚书巷 1 号掘金谜案始末	/ 218
后记	/ 224

上 篇

暗流涌动的金融风潮

孙中山倡建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办始末

马长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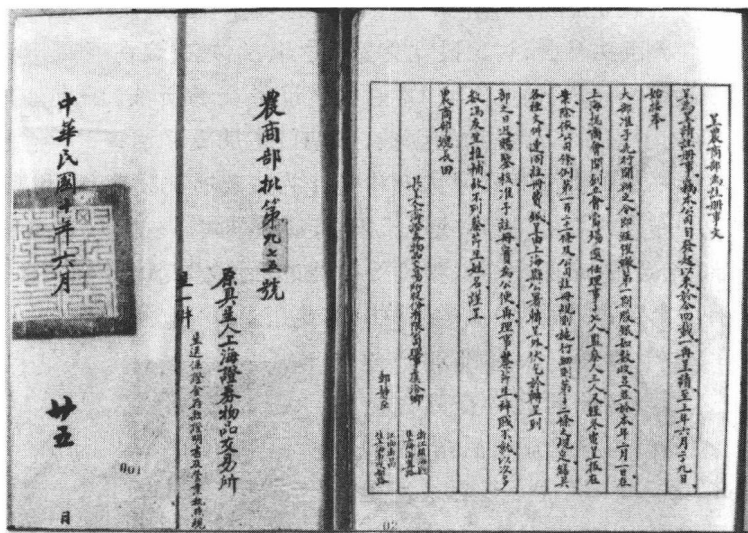
民国初年,各种中外企业股票及公债等证券在上海市场上的交易已很热门,一些著名商人也早有设立交易所机构的言论,于是工商总长刘揆一于民国2年在北京召集全国工商界巨头开会,讨论设立交易所之事,结果决议在通商要埠或商务繁盛地区酌情分设交易所。民国3年12月底,《证券交易所法》正式公布。民国5年,孙中山先生为了筹措革命活动的经费,采纳日本朋友的建议,决定在上海开设交易所。孙中山联络了上海商界巨头虞洽卿作为交易所的发起人,租赁了四明银行楼上几间房间作为办事处,挂起“通记”牌号,嘱戴季陶、赵林士、朱执信等人先对证券、棉花、棉纱、金银、布匹、油料、粮食等行业的沿革和现状进行调查,并商议创办交易所的有关事务,然后由朱执信起草申请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呈文,于1917年1月呈请农商部准予立案。农商部对于孙中山、虞洽卿的呈文,仅批准证券交易先行备案,物品交易须等有关条例颁布后再予审核。但是正当上海交易所筹备之际,北京发生府院之争,张勋趁机闹出复辟丑剧,孙中山离沪赴粤主持护法运动,上海交易所的筹备事宜因此搁置。

1918年初,虞洽卿和纱业公会会长闻兰亭、皮毛公会会长邹静斋、花业公所董事沈润、杂粮油饼公会会长张乐君等人再度发起筹办上海交易所。原来此时在上海的日本商人,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开设一家取引所的准备。所谓取引所,就是买卖物资和证券的交易所。当时在上海的三井物产、三菱商事、铃木、阿部市、伊藤等洋行都是经营棉



1917年春孙中山在上海环龙路寓所留影

纱、棉花、面粉等商品的大业主，他们看到中国商人非常热衷于投机买卖，而棉纱布价的涨落又完全随日本三品取引所的市价而变化(所谓“三品”，因该取引所交易的棉纱为“三品纱”而得名)，认为有这个有利条件，在上海设立取引所必然能达到操纵市场的目的。筹备工作由大阪株式取引所作为中坚力量，东京、京都各取引所及上述同中国有贸易关系的商号纷纷认股，总股份定为 20 万股，其中 16 万股由各取引所和有关系者认购，其余 4 万股向社会招认。这 4 万股每股票面为 12 元 5 角，实际价格为 16 元，由此获得纯收益五十多万元作开办费。一些华商得此信息，便向商界疾呼，如果日人开设取引所，必将垄断花纱布交易，倾轧华商纺织企业，华人实业权势必将完全操之于外人之手。如当时德大厚生两纱厂的经理穆藕初便是其中一人，他到处宣传国人自办交易所的必要，极力赞扬虞洽卿创办交易所的举动，呼吁各界量力认购其股份，成此伟业。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申办文件

1918 年年底，日本人开设的上海取引所在四马路(今福州路)江西路转角处正式开张，主要经营棉花、纱和日本企业股票，同时兼做几家中国公司的股票。到 1920 年上半年结账时净盈利一万多元，所收各种证据金 67 万元。日本取引所的兴旺，更加刺激了华商开办证券交易所的决心。当初孙中山筹划设立上海交易所，营业内容拟为证券与货物兼营，故交易所交易品种除各种证券外，还指定棉花、棉纱、布匹、金银、油料、杂粮六种货物。虞洽卿等人这次重新发起筹备，干脆把上海交易所改称为物品交易所，交易品种为证券、棉花、棉纱、金银四种。经多方张罗，证券物品交易所很快筹集了 10 万股股份，每股先缴 12 元 5 角，共计 125 万元，作为第一期股银。1920 年 2 月 1 日，诸发起人在上海总商会召开证券物品交易所大

会,选出理事 17 人,监察 3 人。2 月 6 日,理事会一致推选虞洽卿为理事长。证券物品交易所花了 20 万元,买下了位于四川路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转角处原长发客栈的一幢三层楼房作为交易所大楼,按各种交易要求将它装修一新,里面除办公室、会议厅、经纪人事务所外,有 3 个大厅作为交易市场,设备齐全,在当时堪称一流。由所员养成所培训的第一批业务人员也已结业,进入岗位。一切均准备就绪,只待吉日了,但农商部的正式批文却迟迟不见下达。这时听说股票商业公会的会员也在积极活动,筹备开办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并已取得农商部的同意,虞洽卿等人决定不等农商部正式批准,先行开张,以造成既成事实,迫使农商部承认。1920 年 7 月 1 日上午,证券物品交易所开幕式正式举行。宽敞的交易所大厅里挤满了前来祝贺的各界人士。江苏省省长齐燮元,上海地方首脑沪海道尹王赓廷,都派出代表前来致词。第二天,交易所即开始营业。开张伊始,生意十分兴旺,各种证券及花纱买卖平均每日可收取佣金二千余元,交易所本身的股票因此成为抢手货,价格骤涨,原先发行时每股票面为 12 元 5 角,不久即高达 60 元以上。然而正当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营业蒸蒸日上之时,社会上却向其刮起了一股反对之风。

首先是社会名流张謇通电北京农商部表示反对。张謇为清末著名立宪派人士,同时又是辛亥革命的功勋,他很早弃官经商,开办大生纱厂、通海垦牧公司等企,是很有声望和影响的社会知名人物。为何张謇会首先出面反对这个最初由孙中山发起的证券交易所呢?原来民国 3 年当张謇任北京政府农商总长时,第一个《证券交易所法》就是由他主持拟订的,因此他清楚地知道《证券交易所法》规定了一区一个交易所制,假如证券物品交易所得到北京政府的正式批准而合法开办,按照交易所法,他人就不能在同一区域再办同类交易所,而此时张謇在南通经营垦植多年,其所办的大生纱厂产销甚旺,他手中棉花、棉纱、棉布货源充足,岂容他人将这大宗商品的交易垄断了?因此张謇率先反对。由于张謇在当时声望极高,又是苏社的领袖,在他的影响下,江苏省议会开会时和苏社掀起了一股反对证券物品交易所的浪潮。

江苏省议会议员黄申锡在省议会上竭力攻击证券物品交易所是“国中极大赌场”,“以定期买卖为名,营买空卖空之事业,开办甫经数月,上海之商民因而自杀者有之,因而破产者有之”,指责其未经农商部正式批准,竟公然开业于公开市场,是为违法,提议省议会咨请农商部将证券物品交易所撤销,停止其全部营业。经黄申锡等人活动,1920 年 11 月初,江苏省议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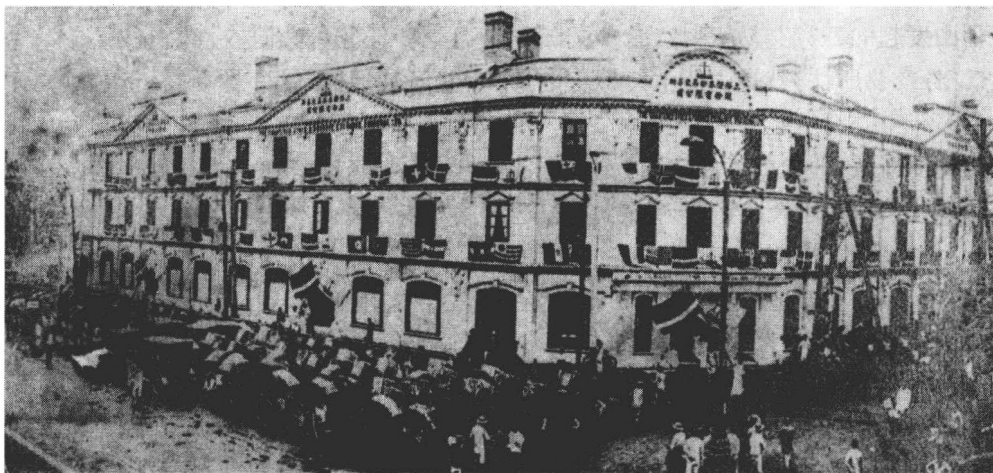
竭力反对创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张謇

正式决议咨请省长公署责令证券物品交易所自行取消,并通电农商部要求停发其营业执照。

面对黄申锡等人的攻击,证券物品交易所在舆论上也不甘示弱,一面以交易所名义在《申报》刊文对黄申锡的指责进行驳斥,一面由交易所副总务科长李孤帆出面致函《大公报》,对黄申锡进行反击。正在双方唇枪舌剑之际,热闹的证券物品交易所内又发生了一场虚惊。

12月8日下午3时许,证券物品交易所大厅内人声鼎沸,经纪人正在竞相报价,突然只听见有人尖叫一声:“这里有炸弹!”顿时交易大厅内人群大乱,纷纷夺门而出,仿佛一场大灾难即将来临。交易所的保镖仔细察看,只见一只洋铁罐头放在交易大厅拍板处的地板上。保镖大着胆子,小心翼翼地将这个洋铁罐头放入水桶内,以免它突然炸开,然后急速拎着小水桶跑到黄浦江边将它抛入江中。事后交易所副理事长闻兰亭得知,大为不满,责令保镖到黄浦江把该炸弹捞上来,将它交给巡捕房查验。但若大的黄浦江,一只小小的洋铁罐头何处去寻?这只铁罐头里究竟装的是炸药还是别的什么东西,只能永远是个谜了。

交易所场内的虚惊虽然很快过去了,但场外的反对有增无减。在以张謇领头,黄申锡为代表的攻击来势甚猛时,原股票商业公会的核心人物范季美、孙铁卿等也在暗中大肆活动,企图拆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台。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业情景

孙铁卿系最早的股票商号“信通公司”老板孙静山之子,他原是钱庄店员,开头只是兼营股票买卖,后来生意越做越顺,便以股票经营为专业。范季美原来是日本留学生,回国后一度担任过通易公司经理,后来担任中国银行北京总行的总司券,他到上海加入华商股票公会成为会员后,逐渐成为证券行业中的知名人物。证券

物品交易所创立大会开过后不久,股票商业公会的一批会员也积极地筹备创设证券交易所,并于1920年5月在汉口路股票商业公会会所举行证券交易所股东创立大会,通过了章程,选出了理事,随即向北京农商部申请营业执照。经向财政部次长李思浩活动,很快得到农商部颁发的营业执照,匆匆忙忙地对外宣布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正式开张营业。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的出现,对证券物品交易所不啻一种威胁。此时北京农商部正在拟订《物品交易所条例》,孙铁卿等人不仅与农商部人员有联系,而且得到张謇的支持,他们企图乘《物品交易所条例》拟订之机,搞掉证券物品交易所这个竞争对手。为争得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合法地位,虞洽卿只得亲自出马,奔赴北京去打通关节。

1920年11月,北京的政局经历了又一次动荡,由于争夺中央政权的奉系军阀和直系军阀双方势均力敌,便推出同张作霖、曹锟两方面均有关系的靳云鹏出任国务总理。靳云鹏本属皖系军阀,早在1917年虞洽卿支持皖系时就同靳云鹏相识,同时新上任的内阁成员农商总长王乃斌更是虞洽卿的熟人,有这几层关系,虞洽卿真是胸有成竹。虞洽卿这次北上活动的目的,是想抢在《物品交易所条例》出台之前让农商部准予注册,发给执照,使证券物品交易所完全合法,无后顾之忧。如果此点办不到,则退而求次,争取在新交易所法里写上有利于证券物品交易所的条文。

对于虞洽卿的北上,社会上一时沸沸扬扬,传说虞洽卿带了证券物品交易所5000股股票,去贿赂农商部给发执照。于是黄申锡等人又致电农商部,要求彻查示复,以释群疑。但虞洽卿毕竟是商界巨头,在北京一番活动,果然有些效果。他在给上海的理事闻兰亭等的信中说:农商总长方面,很有把握,各方攻击证券物品交易所5000股股票活动农商部给发执照,农商总长不但不愿查办,反而向提出此说的议员要证据。当然事情也并非如虞洽卿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虞洽卿虽然同农商总长熟识,但下面具体办事的部员并不买账,他在北京周旋多日,深感这些部员同证券物品交易所“感情甚恶”。而中国银行等方面,却在暗中出力,帮助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这时在上海的闻兰亭等从内部得到消息,修订的《交易所条例》即将送法制局审议,其内容颇不利于证券物品交易所。此时已是12月初,虞洽卿为参加上海劝业银行的开幕式,急于返回上海。为此,证券物品交易所又派出理事、总务科长洪承祁赶往北京。

洪承祁到了北京,除承接虞洽卿介绍的各种关系外,又靠着闻兰亭的关系,四处奔走。几天下来,洪承祁也感到此事非一、两个月不能见分晓,而政局是否在这一、两个月内不发生变化,实难预测。于是洪承祁主动同农商部部员应酬,联络感情,以期望万一政局发生变化,阁员可能变动,部员则仍是老人马,可以寄予希望,同时洪承祁又在法制局物色了人,以防万一。

虞洽卿、洪承祁在北京期间活动,请那些关键人物帮忙,当然不是空头的。例如为了对财政次长潘复的帮忙有所表示,洪承祁在给上海的密函中建议,在劝业银行开幕时,证券物品交易所“当多给予面子”。正是靠着这种物质的作用,虞洽卿、洪承祁在北京的奔波才没有白费功夫。1921年3月,新的《物品交易所条例》正式颁布,该条例一方面在正文中明确规定:“物品交易所只准经营一种货物之交易”,“每区设立一所”,同时又在《附则》中言明:“本条例施行前确经成立之物品交易所”,“查与地方各业无窒碍者,得予核准分别继续营业”。这就是说,现有的兼营各种物品和证券的证券物品交易所,虽不符合《物品交易所条例》正文的规定,但只要“查与地方各业无窒碍”,也视为合法。很显然,这是特地为证券物品交易所网开一面。经过半年多曲折的争斗,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终于在一片攻击声中争得了其合法经营的地位。

1921 年上海交易所风潮

马长林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 1920 年 7 月开张后,营业状况甚佳,据 1920 年 8 月 29 日证券物品交易所召开的第一次股东大会报告,在开业后 46 天的交易中,共收取经手费 82000 千元,平均每天的佣金收入为 1700 余元。从 7 月到 9 月,该交易所 3 个月即获纯利 36 万元。因此每一股证券物品交易所股份可分红利 2 元 5 角,平均年利润达百分之四十八,这使一般的投机商人,包括原来集中在日商取引所搞买卖的人,绝大部分被吸引到了证券物品交易所中来了。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各理事无不眉飞色舞。就是各级职员,年底也都拿到数十元、数百元,甚至千元以上的酬金。

由于经营交易所获利甚多,继华商证券交易所之后,上海杂粮油豆饼交易所、上海面粉交易所、上海华商棉业交易所等也于 1921 年春相继开业。

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国内民族工业在一次大战期间迅猛发展,积聚的资本达 3 亿元,而西方各国在欧战结束后即爆发经济危机,严格限制中国商品的输入,例如英国就借口我国荣氏集团福新厂生产的面粉有皮屑杂质而严禁进入英国市场。国内外市场的萎缩造成国内工商业危机,上海不少工厂闭炉停机,甚至倒闭,工业处于消沉状态,投资者因而观望不前,大量游资徘徊于市场,而交易所行业的奇高利润成为投机获利的强大诱因。20 年代初的上海,许多商人因在欧战期间靠囤积居奇发了财,常具有一种投机冲动。自交易所成立后,一般商人做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在报纸上刊登的广告

投机之风气盛行,工业界在这方面也不甘落后。而在金融界,投机则更为普遍。各银行不仅热衷于有价证券的买卖,而且大做“套头”,即当投机家急需现款来银行转卖其有价证券时,银行即与它们订定合同,规定以两个月为期,该投机家必须以高于卖价的某个买价从银行再买走所卖掉的有价证券,银行于此一进一出之间,套取大量利润。同样,各汇划钱庄,也大半套做股票买卖,以获取高利。这种投机之风,造成了“股票到手,就是钱财到手”的社会投机心理,诱使成千上万工薪阶层,甚至农民也盲目从事于投机,将千辛万苦积攒起来的一点点积蓄投入交易所买卖之中。

民间游资的充斥,社会上升腾的股票热,加上已开办的诸交易所营业的高利润,这一切综合起来,引发了一场开办交易所的狂热浪潮。1921年夏秋之间,各行各业如发狂似地开办起各种交易所,社会上人心若狂,一听说办交易所,就千方百计想预购股票,由是每个月都有几十家交易所开设,在最旺盛的几天,天天可以从报纸上看到新成立的交易所十家八家。除证券、面粉、棉纱、棉布、金业交易所外,糖业、煤业、丝业、纸业、烟酒、五金、建筑材料、茶叶、西药,各种门类无所不有。交易所除了设在繁华的闹市外,有的则设在弄堂里,甚至会馆公所中,有的还别出心裁地打出日夜交易所的招牌,以招揽顾客。像开药房起家的著名商人黄楚九,见交易所盈利可观,也赶上这股潮流,在他所办的大世界游乐场底层共和厅中开设了日夜交易所,使游客在游玩娱乐之中,可以到此满足投机心理。各种交易所纷纷挂牌,其注册也各显神通,有的是正宗的经向农商部注册获得营业执照,有不少则向法租界当局法国领事署、意大利驻沪领事署和美国政府注册,也有呈奉松沪护军使署批准立案,可谓五花八门。当然,有相当一部分交易所则根本没有办过注册登记手续。据统计,到1921年年底,全上海总共有各种交易所达120家之多。这近120家交易所开办后,实际上并没有多少正常的交易,主要是经营其他交易所的股票,甚至有相当数量的交易所将本所股票在本交易所内进行买卖。投机者则施展各种手腕,哄抬股价,从中渔利。有的交易所发起人在成立交易所时自己并未拿出分文资本,只是空认巨额股份,然后设法把已售出的股票价格提高,再抛出自己认购的那部分股票,转手之间,便获巨利。同时又使原先空认的股份变成了实有的股票。

在各种交易所纷起的同时,有十余家新的信托公司也冒了出来。信托公司本来应该是商品经济发展和金融事业兴旺发达条件下的产物。可是这些信托公司的陆续出现,主要是有些人在办不成交易所后转办信托公司。它们多数并不能发挥金融机构的作用,而是像交易所一样从事本公司的股票买卖,谋取暴利。而投机者往往是一面以信托公司的股票作为在交易所投机的筹码,一面又以交易所的股票向信托公司押借款项,如此相互利用,兴风作浪。

各种交易所和信托公司集资开办,其资本总额大约在3亿元以上,远远超过了当时上海全部华资银行和钱庄的资本,社会对现金的需求急剧膨胀,使市面上银根